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

□ 张 城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不管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多严重的政局动荡，它都能开疆拓土，融汇四方，不断凝聚成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华大一统的共同体。其原因即在于它有着人文化成、怀柔四方、协和万邦的天下主义关怀，这即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理想。它既体现了数千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又彰显了在独特的基本国情下的实践要求。

天下观念之历史渊源

对于有着数千年文明发展历程的中国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有追本溯源的使命与能力，不能用近代以来西方的“帝国—民族国家”等概念叙事来简单裁剪复杂丰富的中国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发展道路，就必须回溯传统，认识历史，只有知道了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正处于何方，未来前行之路往哪里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中国人耳熟能详，是中华文明之标志符号与价值理想。“天下”一词内蕴丰富，在先秦时期各种文献中就早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文化源头《周易》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此可见，天下乃是圣王施行王道所治理之对象。这即指出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源头包含最核心的两层义理：一是天下乃赋予生民万物之价值总源；一是天下乃须代表生民之圣王“推天道以明人事”，即行王道。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它既是一

个空间意义上的关于整个世界地图的描述与想象，是人类所赖以居住的整个大地，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又提供了一个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一方面天下的代表者就是人民，民意民心就是天下价值的根本表征，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下为公之义，其最本质之价值特征即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既具有普遍价值，其就不可据而为私。儒家尧舜禹之三代理想就是禅让制，其背后价值理念支撑即是天下为公。天将天下赋予天子，非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之万民。正如《孟子》所言：“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子不得将天下而私视为己有相授受，必须以德配天，德位相配，其使命是“敬德保民”。

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君主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天下为公之制渐行渐远。最明显的例子即是，明太祖朱元璋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并且对不符其意的《孟子》文本进行大肆删改。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深恶痛绝，其以天下为公之价值理念与原则标准对君子专制大加挞伐。“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由此可见，天下观念乃是中国士人一以贯之所持守的价值观念，它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明理想。

天下观念之价值秩序

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接受儒家经

典教育，从内心深处即是深深认同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秩序。每当遭遇王朝更迭、蛮族入侵，都会深深地回溯自身文教的天下主义源头，以证其价值合法性。正如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国，只是一家一姓的权力更迭，而天下，则是四海一家的人之为人的礼仪秩序，具有绝对永恒价值。因此，不论是作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想象，还是作为价值秩序的原则，天下观念都是超越了血缘的、宗族的、特殊的、区域的、族群的、阶级的、职业的、国家的一套普遍主义价值观念，它是中国人很早就在内心深处建立并深深认同的一套文明原则与标准。正如许倬云所言：“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界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中国自诩为文明中心，遂建构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以及与内部边区的赐封、羁縻、土司诸种制度。”

天下主义及其提供的价值秩序，自古及今都是中国人矢志不渝所遵循的一条文明发展原则。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怀抱着天下观念，自古迄今一直未改，真是郭然大公，发乎理性之无对。说民族性，这才是中国的民族性。”

但是历史并非一帆风顺，近代中国遭遇了列强最无情的侵略压迫，这使得救国心切的知识人不断地向西方“取经”，视这条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观念为中国开展现代化的绊脚石而弃之。救国救民无可厚非，历史也

没有留下充足的时间让知识人慢慢理性地思考未来中华文明之发展道路。但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其目标仅仅是追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只能说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自我矮化。

孙中山先生集中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西方列强所谓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无公理；一种是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主义，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本质上是以天下主义为立国原则的文明国家，西方很多汉学家也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因此，我们不应把“天下”观念遗忘，视中国为“民族国家”的同位语，没有了“天下”怎会有中国，这才是中华文明之根源，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价值理念。

天下观念之人类关怀

《周易》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疏：“天下同归而殊途者，言天下万事，终则同归于一，但初时殊异其途路也。一致而百虑者，所致虽一，虑必有百。言虑虽百种，必归于一致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并非是一狭隘的地域文明，中国古圣先贤相信“民胞物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以来就有对人类之价值关怀。天下主义虽诞生于黄河之滨的华夏土地，但关涉的却是整个人类之价值理想。天下观即是一种世界观，思考的对象就是整个世界，以整个世界为其价值原点与前提，天下主义就是对世界负责的一种价值理论。天下观念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价值思考单位的国家界限，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拜占庭帝国衰亡的启示

□ 傅碧涵

国家政治是一种制衡关系，古往今来这种制衡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如果形成一场恶斗的话，则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命运。

拜占庭帝国曾经堪称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帝国，它存在了1123年，超越所有帝国成为最长寿的国家。它创造过最辉煌的文明，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东欧和西欧现存的文化很多都受到它广泛的影响。那么这个庞大的帝国是怎么在1453年灭亡的呢？

拜占庭党争引发了后世的内乱

有一个因素加剧了帝国的衰败，然而这个因素却被当代学者们所普遍忽略，那就是拜占庭晚期“蓝党”和“绿党”之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闹得很厉害，蓝党逢绿必反，绿党逢蓝必反，从宗教、烹调、歌剧乃至服饰，一切问题都相互对立。他们只是反对对方立场，而不是坚持正确主张。这场蓝绿党争消耗了拜占庭帝国复兴的希望。

史料记载：战车比赛在罗马受到强烈追捧，粉丝蜂拥而至甚是疯狂。比赛中，撞车在所难免，虽然致命血腥，但人们偏偏爱看。起初都是奴隶参赛，赢得一场比赛最多可以赢得15袋金，引得奴隶主们趋之若鹜。但是种族的激情导致了紧张局势，有时会酝酿成全面的反抗。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帝国形成后，在首府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赛道竞技场。支持不同战车选手的市民逐渐分为蓝党和绿党，每当举行赛车竞技比赛的时候，他们都争吵不休，甚至斗殴，就像现在疯狂的足球流氓一样，仿佛那就是他们的信仰。

“蓝党”来自大海的颜色，象征着冒险精神，最初的参加者都是海员，后来大贵族和元老院议员也逐渐加入。他们支持皇帝的中央集权。“绿党”取自春天原野的颜色，其成员大多是农民。帝国东部的富商构成了绿党的上层阶级，他们主张地方自治。这两个集团逐渐演变成人类政治史上的早期政党，蓝党代表统治阶级并信仰东正教正统派，绿党则代表新兴市民阶层。

战车比赛被用于政治目的的想法只在拜占庭时期出现过。民众对车队的热爱也达到了一个高度，他们身着喜爱车队的颜色，张扬个性，这种风尚成为拜占庭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装上两党对立的体现。车队不仅展现了他们的体育实力，还体现了他们独特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两派的相互对立实际上也是政治和宗教的不同在对抗，而两党都是国之栋梁，“蓝绿之争”无疑也在消耗国力。“蓝绿之争”一直也在波涛暗涌，然而在一次次赛马比赛中，这股暗流喷涌而出。

公元532年1月的一次比赛中，此举绿党责骂当时的查士丁尼一世偏袒蓝党，此举引发了在场蓝党人士的不满，随后他们在竞技场爆发了激烈的斗殴。绿党代表的人民群众也被不断增加的税收所压迫，他们爆发了，既想灭掉拜占庭皇帝的威风。全场的局势一触即发，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查士丁尼急忙命令驻扎在城外的贝利撒留将军和从外地匆匆赶来的蒙德将军进城镇压起义。那一夜，有4万起义者被杀害，君士坦丁堡成了人间的地狱。

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在他的《拜占庭史》一书中对当时的场景这样描绘道：“大竞技场里愤怒的呐喊变成了受伤和垂死之人的哭泣和呻吟。很快，他们也安静了下来，直到整个竞技场一片寂静，沙子上浸透了遇难者的鲜血。”可见这场旷世之战的惨烈程度！这次剧烈的冲突无疑是君士坦丁堡发生过的最广泛、最严重的暴动，也是“蓝绿党之争”达到鼎沸之势的表现形式。

查士丁尼的镇压改变了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传统，甚至连战车运动这种传统的体育活动后来也被逐渐取消了。战车运动作为

群体运动终结，而与此同时，蓝绿党内斗，阶级矛盾激化，拜占庭帝国的分裂与内乱也在这种大背景下大规模发生了。

从此以后，尤其是到了11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内乱不断。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宫廷斗争不绝，地方势力离心离德，贵族豪门腐败淫乐，拜占庭帝国因内忧外患而日益衰弱。而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内战更使帝国衰败的历史无法得到逆转，内战加速了拜占庭帝国最终的灭亡。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把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看成是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后阶段。

拜占庭帝国党争的教训

人类学早就发现，人类有分派的生物本能。曾经有过一个实验，将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分成两组，给他们穿上两种不同颜色的马甲之后，他们对那些和自己穿着相同颜色的人的评价明显高于另外一组人，尽管没有宣布他们是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小组，他们甚至还没有做过自我介绍。一个正常人对其他陌生人的看法就这样轻易被颜色所改变。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大政治家需要一种人文关怀，对人类命运的迫切关心。可惜的是，一些现代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像拜占庭帝国的蓝绿党争。两党很快形成了双雄对峙的格局，政治生态恶劣化，党派极端对立，在所有问题上对立，而根本不顾及民生。

政客们似乎很热衷于搞“蓝绿相争”，他们恶斗不休，互不相让。这种“蓝绿相争”将大量消耗原本可以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政客们到底在争什么呢？他们经常是在争取相对更高的社会地位，为此，他们不惜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夸大其词，煽动情绪，加剧分裂，推动社会向危险方向发展。他们没有提出像样的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他们只擅长于制造对立。他们很少去调研、了解、认识和同情基层人民到底需要什么。从漫长的历史教训来看，如果任由党争来主导政治的话，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伤害。拜占庭蓝绿相争导致覆亡的历史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世界史林

史籍中的黄河治理

□ 牛志奇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鲜活的历史概述了一部治河史，引导我们探究黄河治理的历史脉络，挖掘蕴含在古籍文献中的文化基因，借鉴古人治理黄河的智慧，弘扬历代黄河治理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服务。

大禹治水与百折不挠的治河精神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计130篇，其中《河渠书》作为《史记》“八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为历代史书所效法，从而使整部《二十四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水利史料。司马迁还首次明确给予“水利”一词以防洪治河、灌溉修渠等含义，开创了沿用至今的“水利”概念。这是中国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司马迁在《河渠书》开篇就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这句话流传至今，脍炙人口。接着讲大禹“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桥”，是讲大禹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克服了艰难险阻，达到“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目的，使九州道路通畅，筑起了九州的泽原，度量了九州山势。司马迁的这段描绘与很多先秦文献都记载一致，大禹常年奔走在治水第一线，“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大禹这一形象可

谓深入人心并传之后世，直到汉代画像石中，大禹依然是头戴斗笠，手执木耒，奔走在山川之间。这是忘我的精神体现，是舍小家顾大家的风骨所在。大禹体现的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象征着中国人的力量，也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几千年来，为我们的人民所秉承，世代相传。

王景治河与王朝兴衰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曄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了东汉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的生平及治河功绩。东汉平帝时，黄河、汴水决口，冲坏河堤。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朝廷征调几十万军队，派王景和王吴修筑渠道和河堤，从荥阳到千乘（现山东广饶县）海口绵延一千多里。虽然王景节约工程费用，但花费还是以亿计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汉平帝亲自巡视，并下诏仿西汉旧制，沿河郡国设立负责河堤的官员。根据这个记载可知，东汉时期征调几十万军队且动用数以百亿的花费治理黄河，在当时社会经济水平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国之大事”。黄河的治理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完成的，只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才能征调军队、花费巨资修筑千里大堤。据水利史研究表明，自王景治河后，黄河800年不曾改道，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也就是说从东汉到宋代，黄河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决溢和改道，为这800年的朝代更迭、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繁衍生



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治理黄河历来是国之大事，重视黄河，就是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清代治水与国家治理

《清史稿》保留了丰富的水利史料，分别在列传和志中有所体现，其中“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主线，记载清朝历史上的治河名人，记载了杨方兴、朱之锡、崔维雅、靳辅、陈潢、宋文运、董訥、熊一潇、于成龙、孙在丰、开音布和张鹏翮等12位治水名臣的事迹。“志”的部分，按时间顺序记载全国诸河、运河、海塘治理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能够全面地了解清朝时期的河流及治理情况。在列传中记载篇幅最多的是靳辅，字紫恒，辽阳州（今辽宁辽阳）人，清代大臣，水利工程专家。靳辅最著名的是他向康熙皇帝就治河连上八道奏折，史称“治河八疏”，就是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作一个整体，全盘考虑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

